

今日视点

“一毛钱处方”与“冻结开药权”谁更好

这两则新闻建议连起来读。

一是《扬子晚报》6月9日报道:常州一市民近日去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,医生只开了一毛钱的药,孩子的病就好了。这个一毛钱处方被誉为“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。”

二是《三联生活周刊》6月9日报道:陕西神木医改经验,如果医生给病人一天的治疗费用超过了230元,电脑就会自动停止医生的开药权。

我们赞赏“一毛钱处方”所折射出的医德医风,但道德感能

够使一个徐医生“锥在囊中——脱颖而出”,但却无法产生推广的意义。毕竟道德支撑出的人格力量是强加不来的,欲让所有医生都对患者慎用处方权,只能是一种妄想。缺乏制度约束的处方权,只能让守职敬业者成为孤本,甚至被既得利益者打入另册。

这样看来,我们也就不必对神木县医生“每日治疗费用超标将被冻结开药权”有了更大的期待。作为全民免费医疗的全国首创,这里的医生绝不会因为免费机

制而比其他地方的医德医风好多少。也许正是出于“一毛钱处方只是个案”的考虑,神木的医改设计者才设计了医生每日治疗费用标准,即便存在一定的弊端,但对控制大处方却绝对是神来之笔。

好的医德医风固然要靠榜样示范,但若真正蔚然成风,那只能依靠制度的约束,依靠监管的到位,方能达到伤筋动骨的功效,促使习惯了开大处方的医生及其医院只能在制度的框架里行医。而这样的逼迫与强制,也才能让患者减

少和免收滥开药方、滥接受检查之苦,这何尝不是节约社会资源、规范医疗正常秩序的力作?

医者的仁心仁术来自哪里?我们希望“一毛钱处方”能多些更多些,但要真正形成风气,根本之策还是借鉴神木医改中的做法,限制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诊疗行为,以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,牵住了医生开处方收费标准这个牛鼻子,牵一发而动全身,加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,最终让患者得到价廉物美和规范的医疗服务。(周稀银)

第二落点

“一毛钱处方”生存的土壤太贫瘠

在看病贵、大处方不断的背景下,“一毛钱处方”医生太珍贵。反过来说,那也是因为“一毛钱处方”医生生存的土壤太贫瘠!去年年末,武汉“小处方”医生王争艳事迹经媒体报道后,得到卫生部的充分肯定。王争艳从医25年,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,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。

当时,在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王争艳事迹时,有一个细节令人回味:王争艳的同学们,如今都是各大医院顶梁柱,大都住着高档小区,开着名牌小车,而她,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

真的,在这个喧嚣的现实生活中,在这个医疗潜规则横飞的行业,“一毛钱处方”医生、“小处

方”医生极端可贵!他们“常在河边走,就是不湿鞋”,这需要抵御多大的诱惑?更有甚者,在那些唯利是图的医院里,医生坚持开小处方未达院方考核指标,不仅得不到奖金,还要被倒扣钱!如果徐莉医生所在的医院也对医生用药作考核,我们也许就看不到“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”了。

当务之急,是让“一毛钱处方”医生生存的土壤肥沃起来——在新医改推进过程中,医院救死扶伤、秉承公益的特性必须是衡量一切制度设计的首要标准,否则,我真担心,那些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的“一毛钱处方”、“小处方”医生这样的“异类”,迟早会被潜规则给同化了。(吴杭民)

第三只眼

没有廉价药,哪来一毛钱处方

医生能开出一毛钱处方,有个前提条件,那就是医院得有这种药,药厂得生产这种药。然而,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,那些只卖几元钱,甚至是几毛钱的廉价药正在从医院消失。媒体就曾报道,一种能祛除蛔虫,以前只卖几分钱的宝塔糖,现在已经找不到踪影了。一位药剂师发现,有

一种以青霉素为核心成分的感冒药针剂,成本仅6毛钱,但是加入一些其他成分后,换一个名字,价格狂升至每盒150到600元。此外,把原来的注射液整成粉状药品;把原来的片剂药整成胶囊药;把原来的粉状药整成颗粒状药……一些廉价药经过改头换面,堂而皇之地标上高价,

再次送进医院或药房。当然,对于廉价药的消失,也不能全怪药厂。毕竟,药厂要生存,就得赚钱。而现行的医院药品加价政策,就使得廉价药无法生存——越贵的药,医院加价15%后的收益就越高。可是要知道,很多国家对廉价药有很好的生产供应模式,比

如由政府指定一些药品厂家生产,然后在税收、定价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,保证这类药品的稳定生存。既然如此,我们的医疗改革能否加大对廉价药的扶持力度,同时给予适当的补贴,让医院爱采购廉价药,让医生们也爱开廉价药呢?(从建锋)

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

说到权力自肥,不用特意强调贫困县



无论是官家豪华办公楼,还是官员联排别墅,“贫困县”不会比不贫困县更离谱,只是风气之下,你会觉得不贫困的县,这样做还说得过去,贫困县也这样,就说不过去了。这是区别对待,好像“负担得起,腐败就无妨”,却忽视了腐败根本不是负不负担得起的问题,而是它根本就不正义。

“河南贫困县审计局豪华办公楼人均超100平米”,“湖南贫困县交通局内建联排别墅”(6月9日《河南日报》、《华商报》),这样的新闻,你看了有何感触?

最打眼的当然是“贫困县”这三个字。豪华办公楼人均超100平米,机关院内建联排别墅,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,这样的事情出在“贫困县”,更加不能容忍。

其实有时候,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,可能与是否贫困没有关系,然而,如果这个地方正好有“贫困县”的称号,那么这个称号仍会被特别强调。例如,酒店开业或庆贺,挂张很多政府部门的祝贺条幅,这样的事情,穷地方富

地方,都会发生的,但河北省赞皇县出了这样的事,报道便是“贫困县酒店周年庆挂20余政府部门祝贺条幅”。

“贫困县”的称号后面,打包了许多相应的意思。最表面的意思是,“贫困县”意味着一定的扶持政策,但也不止于此。它是“穷”的标签,由此而获得与“穷”相关的评价,被人在心里提出相应的要求。人们觉得某些行为富地方可做,而穷地方不可以做。例如大拆大建,在富地方,这主要被认为是拆迁户利益是否能够维护的问题;在穷地方,则主要是你有没有钱大建,算不算劳民伤财的问题。

有些官员总会做一些伤害民心的事,这跟穷地方富地方原本没有多少关系。豪华办公楼人均超100平米,严格地说,跟贫困县或非贫困县无关,只跟权力部门想不想这么做有关。

要说贫困的地方就不能有豪华办公楼,则中国在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远不能算富,但豪华办公楼的数量,中国是有名的多。这与穷和富有一点关系,毕竟穷得叮当响,要盖豪华楼也难,但只要条件稍稍允许,豪华楼就不会差钱了。哪个地方不是“改革开放30多年,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”呢,贫困县不贫困县,豪华办公楼都有条件做了。

官员或国家公务人员有住别墅的能力,这跟穷地方富地方原本也没什么关系。穷地方,富地方,财富都不是均等的。公务人员享受有公款支出,很多人有灰色收入,这人所共知,就算按市场价来住房子,公务人员也是更有条件住好的。何况还往往有土政策,有暗箱操作。像湖南江永县交通局,局机关搬家,机关工作人

员得以在局机关院子里竞买土地,自建住房,联排别墅就住上了。这事情,跟江永县是不是贫困县没有关系,“贫困县”在这里只是一个让人更加气愤的说头。

很多问题是普遍的问题,正好遇上贫困县也在做,强调一下“贫困县”,或许确实可以让人看到事情是何其离谱,但在“新闻效应”的追求下,却容易放过那些非贫困县的同样做法。

过于强调“贫困县”的身份,还容易让人义愤大于理性,从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症结,症结实在不是“都贫困了还这样子不像话”,而是不管贫困不贫困,权力都要自肥。

无论是官家豪华办公楼,还是官员联排别墅,“贫困县”不会比不贫困县更离谱,只是风气之下,你会觉得不贫困的县,这样做还说得过去,贫困县也这样,就说不下去了。这是区别对待,好像“负担得起,腐败就无妨”,却忽视了腐败根本不是负不负担得起的问题,而是它根本就不正义。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)

聚焦高考

“高考改在周末”有那么复杂吗?

今年高考恰逢周一、二,不但给城市造成较大交通压力,而且给不少家长带来不便,迫使不少人特意请假陪考。考生及家长纷纷建议将高考固定在每年6月第一个周六日。对此,教育部新闻处表示,一旦调整即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需要组织专家调研、探讨“高考改在周末”这一话题。

(6月9日《信息时报》)如果搞一个“全民表决”,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“高考改在周末”投赞成票。昨天一家门户网站的网上调查显示,超过8成的网

民支持这一建议;再把时间往前推,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,就有一些政协委员提出类似提案。凡此种种说明,“高考改在周末”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。

人们呼吁“高考改在周末”,在情理之中,“高考改在周末”无疑有利于考生避开正常工作日让人头疼的交通堵塞问题,较为轻松地赶考,家长也不必为了陪考而请假。对社会来说,选择在周末高考,也可以节省不少资源,不必为了给高考保驾护航,大量调动公安、交通等部门的公共资源。

当然,“高考改在周末”,并不是所有群体都受益,考务部门就要为此加班。正如有专家指出,“高考时间更改,会让有关部门固定在周末加班,缺少合理性”——这恐怕也是教育部门委婉反对“高考改在周末”的原因所在吧?高考一年只有一次,如果改在周末能给考生及家长带来便利,同时避免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,那么,考务部门的辛苦是很有社会价值的,而不是以此作为借口否决高考时间调整的建议。

这让我联想起研究生考试,司法考试、自学考试,乃至英语四六级考试等,这些同为国家级的考试基本都定在周末举行,说明“高考改在周末”在具体实施上应当不存在什么障碍,恐并非如教育部新闻处所说的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

道理很简单,之前高考定在7月,之后改在6月,也并没有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造成什么不适,照样有条不紊地举行。以此为鉴,我们对“高考改在周末”的可行性也就不会有什么忧虑,它只是在高考制度这台机器上换个螺丝而已,习惯也就好了。(修仰峰)

公民发言

高票价为地铁减负 不折不扣的馊主意

“地铁高峰时段加价到五六元都不为过。”北京市政协委员陈杰建议发改委考虑通过“限时加价”的手段,为高峰时段的地铁运营“减负”。近日,北京市发改委表示,将研究采纳委员关于提高票价的建议。

(6月9日《新京报》)

北京地铁也许将效仿“铁路老大”春运模式,在每日高峰期将2元的地铁票价调整到5到6元,而目的竟然是为了通过“限时加价”的手段,促使一些非上班族选择其他时段乘坐地铁。铁路春运票价上浮被炮轰的波澜尚无法平息,地铁也来个高峰时段涨价,老百姓果真是太有钱,让一些政府部门如此惦记。要知道,北京地铁“2元随便坐”的低票价,一直被视为公共交通公益性的最佳体现,一旦北京地铁实行高峰价,其他地方就可能跟着学——能来钱的事,有些部门一贯积极得很。

以高峰票价调节客流,其实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。春运就是最好的例子,多年来春运火车票价上浮并没有减少人们回家的脚步。那么,地铁高峰期加价,就一定能分流了吗?如果说回家过年是一项传统社会人情和风俗,尚可以通过观念的改变而慢慢移风易俗,那么上班和出门办事,则明显是没有选择的必须行为,高票价怎能阻止人们上班的脚步?

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现状,全力发展多样化的公共交通、错峰上下班分流出行高峰,这些,无一不是缓解地铁压力的方法。但北京市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却只简单地想到了提高票价,是驴技穷还是懒政思想作祟?(刘鹏)

公民发言

多为人民服务 少给人民添堵

“为人民服务”是个特好的理念,但也有不少“给人民添堵”事也打着服务的幌子,这着实让人困惑。

《楚天都市报》6月9日报道,河北省内18条国家高速标志牌将换新装,这就意味着人们熟悉的“京石高速”等名称将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“G4京港澳高速”等全新名称。

早在去年10月,上海就把市域内所有高速公路的名称和编号换了一遍,搞得短期内老司机都找不着北。显然,此次河北也想到了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,所以也提醒司机,出门前最好先查看地图,明确出行方向。这种“解决方案”的态度很明确:我说换就换,这是板上钉钉的事,给你们带来的麻烦,自己想办法解决!

我觉得这些牌子没必要换,我说了不算,就算真的是有必要吧,政府在推进此项工作中所体现出的“服务意识”也令人不敢恭维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高速公路“改名”应当有个过渡期,在过渡期内,新旧两种名称和编号的标识牌(特别是电子标识牌)应同时使用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?

这不只是一个细节的疏忽,更是政府“服务意识”的缺失。假设决定官员政绩考核的最终裁判人是每一个公民,如果政府官员在整个“换牌”过程中因考虑不周或政策不到位,而影响了公民的正常出行,则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投出自己的“否决”票和“不信任”票,从而直接导致官员被罢免或被处分,结果又会是怎样——至少每个官员都会时刻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。

“为人民服务”不能靠官员的良心和觉悟,而要靠制度保证。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,我不相信还有普遍存在的无条件“服务”,而在更多正常情况下应是“相互服务”——官员为公民提供满意的服务,公民为官员提供信任和选票。同理,如果能够给官员提供任途和利禄,如果“上级领导”,那么官员们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更高的权力而非人民。(陈泰然)